

傳記文學叢刊

西北從軍記

尚文撰

西北從軍記

荀美撰

西北從軍記

尚文撰

傳記文學叢刊之六十四

西北從軍記 目錄

第一部：西北從軍記

與馮徐關係之淵源·····	一
投筆參加革命軍·····	八
臨別贈言·····	一一
僕僕遠征·····	一三
將軍揖客·····	一九
從戎第一功·····	二二
軍中生活雜記·····	二八
西北軍參加革命之經過·····	四〇
政治工作·····	四六
東出潼關會師中原·····	五四

前敵政治工作·····	五八
鄭徐之會·····	六二
清黨運動·····	六五
鮑羅廷過鄭州·····	七〇
寧漢之間·····	七八
前敵政治部·····	八一
「紅槍會」之役·····	八六
回粵省親·····	九四
代理政治部部務·····	九九
洛陽今是學校·····	一〇三
第二部：宦海飄流二十年	
引言·····	一〇九
山東鹽運使·····	一一一

魯豫陝之變局·····	一二九
國民軍再生·····	一三七
擴大會議與中原大戰·····	一四二
鐵道部參事·····	一四九
「非常會議」·····	一五八
官上加官·····	一六八
于役南北·····	一七七
立法委員·····	一八三
業餘的工作·····	一八九
「逸經」的歷史·····	一九三
抗戰時期·····	二〇四
「大風」之緝辦·····	二〇六
「香港青年救護團」·····	二〇八

國民黨港澳灣總支部·····	二〇九
中國文化協進會·····	二一一
日軍襲九港·····	二一五
九龍淪陷·····	二二〇
失守後的香港·····	二三〇
虎口逃生·····	二四〇
立法院復職·····	二四九
回到廣西、金田之遊·····	二五四
往來渝桂·····	二六〇
違難蒙山·····	二六四
南下梧州返廣州·····	二七五
廣東文獻館·····	二八一
息影九龍·····	二八八

西北從軍記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十日，是我一生的大紀念日。是日也，我在廣州加入中國國民黨，旋被中央黨部派赴「西北軍」馮玉祥總司令處任「政治工作委員」。是爲我離開文教界而從軍從政之開始。年方卅歲。當時，馮氏已由蘇俄經庫倫返國，於九月十七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軍陣線，接受黨命黨旂，整頓前由南口苦戰數月後撤退西陲之「國民軍聯軍」（包括故胡景翼之二軍、孫岳之三軍、方振武之五軍及新編弓富魁之六軍各部）。復督率全軍遠征，經甘肅，入陝西，而解西安之數月長圍。他屢電中央黨部，請多派政治人員前往工作，加緊準備與革命軍會師北伐。因爲我與馮有舊，所以孫科（哲生，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徐謙（季龍，時任司法部長）兩先生薦舉我擔任「政治工作委員」，前往爲黨國効力。

與馮徐關係之淵源

先是，自十三年「國民軍」馮、胡、孫等之「首都革命」成功後，奉系張作霖與皖系段祺瑞互相

勾結，迭背前盟（包括與粵方締結之「三角同盟」），拒絕國父而排擠馮等。馮遂萌消極，退任「西北邊防督辦」（前於十二年五月黎元洪總統任內張紹曾內閣所任命者），設總部于察哈爾之張家口。振作有爲，立意努力開發西北。軍中有「基督教青年會」之設，以爲將兵謀福利，及如舊傳播基督教。總幹事爲陳崇桂牧師。其時，我方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任副教授，屢被邀請到張垣演講。初次會見馮氏時，他即從辦公桌抽屜內取出一張名單，上列幾個人的姓名。我在其中，而名上加了三個大圓圈。他與我略談各問題後，即誠懇邀請我擔任他的秘書，幫助他從事革命工作。這真是突如其來的革命宣召。我當時回答，因受了燕大之聘，先要回去徵求大學當局的許可方能解約。他也了解，說：「遲些再議」，並坦白聲明「這是徐季龍先生特別推薦的；很盼望您惠然肯來這裡，共同吃苦而爲革命服務。」這次談話表露馮氏「求賢若渴」、徵求人才爲助之熱誠。這出人意表之邀請，幾乎使我吃了一驚，即便留下一深刻印象於腦中。

徐先生，安徽人，清季翰林，曾赴日精研法律，參加革命，爲當年「革命三翰林」之一（其他是譚組庵延闓，蔡子民元培）。後追隨國父，任秘書長，屢奉派北上運動馮氏附義，聯絡多年，乃有「首都革命」之實現，厥功甚偉。他之薦我與馮，也有淵源的。原來他早已皈依基督教。民國八、九年間，遊歷美國時，到處向華僑宣揚他所提倡的「基督教國主義」。在芝加哥曾演講幾次，都用國語，華僑聽不懂。湊巧其時我方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因被邀任翻譯。因此互相結識。他認爲同志，將來可同事合力爲國効勞。我回國，亦曾與他再晤談，但其時我志在文化教育事業，無心從政。及十

三年春，我北上任職燕大。秋間，「首都革命」成功後，他即專誠向馮氏一力保薦。所以馮初與我會面，即有「一見如故」之概，再三懇切邀我任職。回京後我細心考慮這出處進退大問題。結果，容易解決得很。燕大方面自然不肯放我走。而我呢，則以受聘到校未及一年即見異思遷，於心不安，且舍學從軍，亦非素志，故不辭職。馮處亦無下文。

會於翌年五月杪，我趁暑假南下省親。到滬時適在「五卅慘案」發生後一日。眼見全市滿目荒涼，杳無人跡，大路上店舖關門，被英人屠殺的學生等血跡猶鮮，不禁淒然於心，憤恨至極。及回抵廣州，又適當香港海員罷工風潮，引起全港各行業工人紛紛罷工響應，絡繹離港，致令其成爲一個死埠。六月廿三日，廣州全市學生，爲對英抗議，聲援罷工，舉行示威大遊行。群推美國基督徒私立的嶺南大學員生領隊。全體數萬人（內有不少民衆參加）浩浩蕩蕩，由長堤西行，經外人居留地「沙面」對河之沙基，人持旗幟，高呼口號，聲勢甚盛。不料遊行隊中忽有一聲槍響，而對河橫列於沙面沿岸之英軍立即開機關槍向人叢亂行掃射。登時遇難之民衆六十人，學生卅餘人，受傷者五百餘。（嶺南死教員一，學生一。）餘衆四散。是爲「沙基慘案」（見孫科：「八十述略」頁十四）。（後來沙基馬路命名「六二三路」。）當時，我方在長堤「青年會」與友人下棋，擬完局後加入遊行，故幸未被波及。但事後親覩慘狀，觸目傷心，憤恨之火愈熾。後來，據當時任公安局長之陳慶雲告訴我，經調查結果，證明那大遊行是共產黨所組織與指揮，而那首先開鎗者是共產黨徒，實蓄意製造此兇案以利反英運動，不過格于當時聯俄容共政策，未便宣布云。當時左派廖仲愷、何香凝夫婦的女兒廖夢醒也

在遊行行列中，倖免于難。可見組織嚴密，連左派領袖也不知內容與陰謀。

我于是搜集種種公私紀錄與報章記載，準備携之北上向國人宣傳真相。臨行時，又由其時廣州市長伍朝樞（梯雲）託我帶了一份詳細報告書面交北京外交部，俾藉以向英交涉。我由粵垣直接乘輪船到滬（經香港之水陸交通完全斷絕），在滬上旅館暫住，忽于深夜間有英租界警察數人衝入臥室，肆意搜查行李，將我及個人所有剪報紀錄文件一齊解送「巡捕房」。（幸而伍氏所託帶文件未被搜出。）英警官數人連夜對我施以疲勞審訊，疑我是來滬的搗亂分子，辱罵備至。當下我即表明燕大教授身分，並說明剪報記載為個人紀錄研究之用，而以懺切態度，苦口婆心，對他們說，中英兩大國應睦睦友好，和平共處，在滬在粵一連兩次大屠殺，皆不必有的暴行，不唯兇殘無人道，且大為不智，徒種下民族仇恨禍根而已。言下，也有警官唯唯承認那是錯誤的妄舉。直到凌晨三時，案還未結，突有一美國文化界朋友葛連（Green）進入警署訪問，表明自己身分是美國記者，特來訪問我被捕的原因及事實，以便報告全世，因為，他說，我是有名大學的教授，在國內外有許多朋友將必關心的。（這友人之來援是我在旅館被捕後，私用粵語關照侍應生按址通知他的。）英警官登時斂容變色，乘機下臺，忙說「無事無事！他可走了。」美友乃偕我取回各件，一同出門。翌晨，我即乘車北上，將伍氏公文送到外交部去，兼向各方詳細報導「沙基慘案」之實情。

此時，反英空氣，瀰漫全國；「打倒帝國主義」口號，處處可聞。暑假猶未完，一日，忽有北京幾家英國教會主辦的學校學生代表數人來訪，聲言迫于愛國熱誠，各校同學數百人公決全體退學，以

示反抗暴行，並堅請我爲他們設法，俾得繼續求學。我在燕大，因同情革命，屢有表示，所以那裡熱心愛國革命的學生，都奉我爲導師；凡有愛國集會皆請我主持及演講。由此，全城的學生也漸知我的立場，又經我最近爲「沙基慘案」大事宣傳，所以他們聞風趨至，有此請求。我因助人愛人的宗教動機，救援失學的教育興味，及愛國革命的一片熱誠，交迫于心，自然同情兼贊成學生們的行動，但個人能力有限，何能爲助？只有獻計教他們派代表去張家口馮將軍處求援。他們一致贊成，但必要我領導和介紹。我義不容辭，乃于翌日偕同男女代表三人前去。

馮氏對於兩次慘案早已義憤填胸，曾有電表示抗議。一聽學生等的陳辭，立即發言嘉獎，表示同情，且允盡力爲助。適徐季龍先生代表國民黨到馮處聯絡。彼此共同商議，馮撥出大洋一萬元，辦新校以容納各學生，但堅要我任校長爲條件。事由我動議，「箭在弦上」，不由我不答應。當即與代表們回家，約志同道合的幾人，如寶廣林、陳文駐、胡剛、陳國樑、何志新、饒世芬等數人，合力趕急籌備。徐先生命校名曰「今是」，取「今是昨非」之革命意義。由馮、徐邀約王寵惠、顏惠慶、王正廷諸位，與徐氏及我共同成立董事會。

當時，男女分校，男校在西城暫租大廈爲校舍；女校在西郊海甸，借用前清頤和園之「儲秀宮」（毗鄰燕大新校址）；均兼辦宿舍。一月之內，一家高初中級完備的中學，居然能在秋季開學。校中主持校務者全當義務，教職員則每人一律支伙食費卅元，皆本愛國精神而服務者。入學男女生共五百餘人。師生合作，親愛如家人，以故校務順利進行，學業成績美滿。經費不足，余復出賣所譯書稿四

本得大洋千元，又從南方親友捐款數千元以資維持。未幾，全城人士，均目爲「馮玉祥學校」，或「國民軍學校」了。我與馮氏的關係自是又深一層。（「今是」叻辦事見馮著「我的生活」頁五二九，略提及。）

翌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愛國民衆及學生，爲抗議帝國主義的無理要求，舉行示威大遊行，乃爲「臨時執政」段祺瑞之衛隊開鎗亂射，當場遇難者二十五、六名，傷者四十餘人，繼續死于醫院者又廿餘人。「今是」男學生一人亦登時喪生。事後我親去收屍及領回校旂，均不准許，憤恨益深。後于四月十日，「警察總監」張璧及「國民軍」將領北京警衛總司令鹿鍾麟派隊圍執政府，欲捕段治罪。段聞風逃匿東交民巷得倖免，而其衛隊全旅則被繳械遣散，民恨稍雪。未幾，段遁天津，由是一蹶不振矣。

時，奉張，魯張（宗昌，前直督李景林餘部加入）竟與再起之直系吳佩孚，化讐同盟，聯合壓迫「國民軍」。十五日，鹿氏全部最後撤退北京。全軍固守南口。奉魯直聯軍復佔北京。「今是」乃大受影響，不得不暫行停學。風潮稍平靜，乃由王寵惠、顏惠慶，以校董名義致函奉張爲「今是」關說。于是，復另租大厦于城內重行開課。男女同學，卒得捱至六月底，舉行第一屆高初中畢業禮。

在暑假期間，我不知時局好歹，不顧個人安危，仍留京主持校務，準備秋季開課。其間，軍政大局變化。八月中，固守南口之「國民軍」不堪奉直聯軍之猛烈的及長期的攻擊，再往西撤退。時，馮氏已去國赴俄。西北軍政全歸張之江主持。余派何志新遠赴包頭晉謁，請示進行。蒙其鼓勵，勉以盡

力復課，並於經費極度支絀下仍撥款三千元，交何帶回。「今是」乃得於九月間，繼續開課。這是「國民軍」在北京所留下唯一的痕跡。

當時，「國民軍」籌備反攻。京中潛伏多人作地下活動，統由居于東交民巷的熊斌指揮一切。我由何志新介紹，得與其工作人員聯絡，解囊接濟其生活，亟亟籌謀反攻計劃。已約定起事日期，奉直軍亦加緊準備迎擊，惜又因事見阻，事卒無成。而我個人之安全乃發生問題了。

一日，忽有最近在燕大畢業的學生王德曦來見。他在校學業成績平平，因我在校待學生如弟妹，且曲意栽培，頗得人敬愛。王生所上我的課也得及格，所以懷有感激之心。他求學雖稍差，而求事却有辦法，竟被他攢入奉方圈子，得任稅務局長，日與奉派軍官週旋。因得知奉方注意及我，且向其打聽我的思想行動，他一力維護，爲我辯白。他又告我軍政方面所要「肅清」的黑名單。據說，初時奉、魯、直三方各具一名單，後經共同會議，或留或舍，成新名單，共廿四人，皆目爲必須捕殺者。第一名，民報總編輯邵飄萍，素以直筆大罵奉魯軍閥著，即被捕鎗決。第二名北大校長蔣夢麟，適在東交民巷晚宴，得知消息，乃留下暫避，遂得倖免。第三名亦爲罵奉魯軍閥及政客最烈之名記者林白水，亦遭難。其第十八名則爲我。他請我加意小心，免遭毒手。我十分感激他的關懷，準備躲避。

旋而又有少時在廣州嶺南中學的同級學友薛基縣君來訪。他畢業北洋大學礦科，歷在東三省任事，與奉方軍政要人多熟悉，甚有聲望與地位。他也知道上述的消息，說「老簡，風聲甚緊，危險太大，要走了。」叫我立隨他去。我當將校務交與同事代理，收拾幾件衣服，帶了多少現金，從他出門，

乘他的汽車，一直往車站去。我問他到那裡去，他答：「不要問，只是緊隨着我。見到甚麼，不要驚慌，鎮靜爲要。」不料一上火車，把我嚇了一跳，原來那是一列開赴東三省的奉方軍車。他密向我耳語：「少說話，隨我來。奉軍無一認識您的。」我心中一想，確是事實，誰料到我會乘方要捕我殺我的奉方的軍車出亡呢？他一直引我進入頭等花車車廂，還遍與幾個高級軍官打招呼。人人叫他「薛處長」。他還正式介紹我與他們相識，當然用假姓名，認爲親戚。及憲兵來查，他又帶我從前門下車，憲兵走後，再從後門復登。車到天津，他乃讓我獨自下車，安全進入租界。這確是妙計，軍官們只認識他，尊敬他，有誰懷疑他私行帶走要被通緝的要犯？又有誰思疑方自高鳴勝利的奉軍、以專車送走這要犯呢？由是，我在租界化名「楊玉夫」，籍貫廣西，買了外國船票到上海，安然回到廣州。

投筆參加革命軍

由民國十三年開始，我在燕大，于準備講稿，編譯書籍，寫作論文外，兼治「太平天國」史。但我本是「革命世家」（先父寅初公是南洋華僑，在星加坡先後加入中國同盟會及中華革命黨，効力革命，蒙國父任命爲南洋籌餉專員），師友多革命黨人，自幼即醉心革命。及長，乃志在研究學問，不涉政治，但只是同情革命運動而已。此次，因被壓迫而初度亡命生活，在船上沉思往事及考慮前途，以決定今後自己大計。我在北方三年，目擊北方軍閥政客之貪污、淫穢、兇殘、腐化、爭權奪利、禍國殃民、罪惡滔天、黑暗瀰地與夫帝國主義之欺凌吾國、殘害同胞，猶且互相勾結，貽害國族，不

禁憤恨填膺，實在忍無可忍，必要打倒他們而自己願意做一個「馬前卒」。

除了這愛國熱誠，又因有宗教動機。當時，我很受了曾到北京演講之華德教授（Harry F. Ward）的影響。他是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的「基督教倫理學」教授，提倡革命的基督教、社會福音，我爲其擔任翻譯多次，印行「工業主義的倫理」一書。此時深覺空言基督教愛天愛人、神學聖經，于國于民補益甚少，亟欲運用宗教真理、愛人宗旨、犧牲精神，與軍事政治配合，出以實際行動，改革社會，建設新事業，庶足以適應國家、人民、社會之需要，則個人或有多少貢獻。因而想起馮氏素以「基督將軍」著名世界，真心爲國爲民，其所統之「國民軍」的確實現「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兵官人人佩在胸前的襟章有此十字）之口號，不禁心焉嚮往，認爲可與爲善，值得同事。而況心中又念念不忘馮氏在張家口之「知遇」，曾相約將來有機會再議，宛如舊盟。又轉念個人隻身逃亡，不再廁身北方教育界，其他處文教界亦無適當機會加入，尤其因全部參考書籍、研究資料，均留在北京（寄存燕大圖書館），真有無地容身之感。在這心理反應之下，心理不禁咒罵一般萬惡軍閥和政客：「好吧！你們把我踢走，待我回粵班齊人馬，加入大軍，誓要把你們踢走，再來治學。」于是，投筆從戎的決心立定了。

國民政府已于十四年七月，由大元帥府改組成立，編組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一回到廣州革命軍大本營，我即趨謁徐、孫兩先生，陳明此次回來積極參加革命的決心，他倆均極表歡迎。徐先生與我相結識的經過，上文已述及。孫先生與我有兩代黨誼及世誼的關係，而且是多年老友和同志，早于

民十一年討陳（炯明）之役追隨其効力。他出任廣州市長，蒙其委任爲教育局局長，雖因父病未就職，固已算是他「門下士」了。以後，在南北仍常見面。適其時廣東省政府農工廳廳長出缺，他示意推薦我承乏。我表示無意爲官，此來只欲効力革命而已。重以新進黨員，毫無勞績，即任高官，縱不受同志譏彈，自問于心有愧，乃固辭。會馮將軍由俄歸國，九月十八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正式加入國民革命陣線，接受黨旗，以政治工作人員非常缺乏，迭電廣州黨部，請多派得力同志前去爲助。此消息大獲我心，正符私願，即請纓到西北去。孫、徐兩先生一力贊成，向中央黨部薦舉，任命爲「西北軍政治工作委員」。我即于國慶日補行入黨手續，接受委任狀——一張小型黃色長方的硬紙，上書任命（三吋闊，二吋高，以便攜帶），並發給旅費大洋一千元。（我自己另自備千元以防急用，銀幣纍纍，行李笨重可知。）

中央派出政治工作委員四人，除我之外，有郭春濤、鄧飛黃（二人即所謂「新右派」，反共最烈）、于永滋（共產黨），另「政治工作員」趙文炳等十四人（其中數名爲「共產黨員」）。當時，我初入黨，固不屬某派，亦不明瞭黨內派系之爭，只知爲黨國服務、努力革命而已。然這批政治工作人員成員如此，已隱伏將來在馮軍中內部黨派鬭爭之機矣。北上途徑則由各人自決自行，以西安爲目的地。有趙文炳等二員，因攜帶大量宣傳品，不便由內地前往，乃倍發旅費由海道假海參崴，轉火車經庫倫，過蒙古沙漠，艱苦備嘗，數月後始到西安。